

跑泉厂村修械所纪略

刘俊喜

1937年10月初，八路军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部队挺进敌后，以五台山为依托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广泛发动群众，随后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——晋察冀根据地，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不久，一批五台籍太原兵工厂工人从太原回到老家五台县。晋东北游击大队司令赵尔陆了解情况后，迅速找到聂司令员建议：这些人修枪造炮个个技术熟练，正好成立自己的兵工厂。聂司令员听了，连连夸奖：“太好了！这些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我先成立一个枪械修理所，筹集修理工具和设备，进行枪支修理，等以后队伍壮大了，再建兵工厂，生产我们自己的手榴弹、地雷、子弹，这样才能彻底满足我军消灭打击日本鬼子的要求！”

聂司令员看到这些工人后很高兴，宣布成立军区供给部修械所，任命戎修德为所长，命令军区炊事班杀猪宰羊，热情招待。这些工人们见八路军如此关心和器重他们，个个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，纷纷表示，一定要好好干，修好武器，多多消灭日本鬼子。

工人们呼朋唤友，很快扩大了队伍，1937年12月，修械所成立，属军区供给部管理。当时条件很差，照明用油灯，动力全靠人工。拉风箱、烧铁炉、抡大锤，手工锯、手工刨、手摇砂轮。这些工人确实不简单，不仅能修理枪械，很快生产出红缨枪、大刀，而且能装配枪支、子弹，制造手榴弹、地雷。不仅用于八路军、基游队，而且武装了儿童团、自卫队，为打击日伪、粉碎经济封锁起了很大作用。

那么这修械所在哪呢？就在太行山长城晋冀分界线上，驼梁山腹地、五台县跑泉厂村。抗战期间，跑泉厂村村民为修械所的创建和发展都出过不少力。

随后，各边区、各军分区相继成立修械所，散落在各地的太原兵工厂工人，成了“香饽饽”。

1938年9月，日军纠集华北五万兵力，进攻晋察冀边区。10月3日五台县城沦陷。随后，军区供给部转移到河北省阜平县羊道村，跑泉厂村修械所迁移至河北省平山县桑园口村。修械所迁移时，由于情况紧急，时间仓促，部分军械来不及运走，只好就地埋藏。

“扫荡”过后，军区将平山县桑园口村修械所改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第一修械所。同时，将部分人员与机器设备回迁跑泉厂村，组建成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第二修械所。

这时的跑泉厂村修械所，已经设有机工股、木工股、铁工股、锻工股等，门类齐全，不仅能制造刺刀、地雷、手榴弹，而且能仿制八音子手枪、手提式冲锋枪、捷克式步枪等武器装备。

红色记忆

千佛寺是古交境内最富盛名的千年古刹，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据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《重修千佛寺碑记》记载，该寺“始创自唐，由来久矣”。《古交志》《古交村志》等方志所载：“千佛寺始建于唐，续建于宋，扩建于明。”随着历史的变迁，千佛寺历时一千多年春秋寒暑，历经三迁，经过了无数次的翻新、维护和修复。

千佛寺始建

千佛寺始建于汾河北岸，西曲村旁的纺车沟（现名**矾石沟**），在距沟口5里开外的一处向阳坡地，半山腰间一片原生态台阶基地上。矾石沟后又称梵寺沟，显然以寺而得名。而今入矾石沟5里之阳，有一处古地名——千佛洞，尽管看上去既无洞穴又无佛，但存有古老的砖块瓦砾遗存。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一处明代古墓，出土了古铜镜等珍贵文物。千佛寺内有千佛洞，洞内有千尊石佛石像。千佛寺始建于初唐，因千佛洞中的千尊石佛像而得名。现存的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《重修千佛寺序并诗》古碑可佐证。

庆幸的是，当初千佛寺内千佛洞中的1144尊唐代石刻佛像，几经风波，几历搬迁，现仍完好存于新建的千佛寺主殿中。这也正是古交千佛寺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因所在。

千佛寺重建

重建的千佛寺地地址位于原古交镇西南，古地名寺塔梁之下，新建大道“千佛路”以里。重建千佛寺的时间推移到北宋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，据现存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《重修千佛寺序并诗》古碑所载：“古交之乡有古刹焉，名曰千佛，两川相挟，背山临水，左有钟楼壮其威，右有井泉毓其秀，前有石寨神其灵。森然雄伟，郁然佳丽。”

元明之交，寺院屡遭兵匪之乱。明成化七年（1471），重修千佛寺，直至明弘治元年（1488）才告竣工，这次复修历时18个年头，将原寺扩建成一座具有相当规模、独具特色的十方梵刹。然而，明末，千佛寺又遭兵灾战火，到清代又几经复修。从明代成化至清代道光年间，千佛寺经历了六次较大的翻新复修，以碑记为证，均藏于寺中。1932年，千佛寺最后一次复修不久，日寇侵华，寺院再次遭到严重破坏。

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开始受到关注。1980年，中央财政下拨专款用于千佛寺的抢救性保护，并在寺内设立了文物管理所，对这一处古交市代表性文物进行重点保护。1983年10月11日，太原

太原的西村养育了傅山，傅山也在其诗书文字中记载了西村的历史、宗教、风土、饮食乃至景致等，保存了宝贵的乡邦文献。

《冰灯诗》中见西村

冰雕之盛，早在唐玄宗时期，已蔚为大观，之后历代都有流行。明末的太原西村，制冰灯庆佳节，已成一方风俗。每到腊月，村民纷纷聚集在上冻的汾河凿冰，然后将冰块打磨成各种式样的冰灯，观赏祈福。到了正月十五，亲朋相聚，好友雅集，冰灯也是重要的摆设，甚至成为“主角”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西村人，傅山对这一习俗有着特别的情怀，不但热衷赏玩，而且亲自上手，曾凿千亩琉璃田，搬冰回家，储于天井，将树根整形为灯座，注水于冰块之上，燃烛于冰块之中，打造出千姿百态的冰灯世界。自赏之余设“寒冰筵”，邀好友同赏，饮酒赋诗唱和。“初拟打冰作灯，冰冰人苦瘃瘃。时劳以酒，作打冰曲，和冰人打冰。冰块皆不假造作，颇兀倾欹，奇丑任性，少可承藉。思得古怪树根，凿为盆盆措之。”作《冰灯诗》十五首，颜其斋曰“冷云斋”。兄长傅庚以为不凡，亲为作序；好友同道梁云辉啧啧称奇，专作为跋。

诗画《西村》颂西村

傅山有诗题曰《西村》：“西村带河曲，十月停秋光。柳葺轻黄雨，莲花老绛霜。村翁负朝旭，野鸭静寒塘。红饭慰调怒，劝人新豆香。”汾河东岸的西村，柳叶泛黄，莲花绛



名都自古并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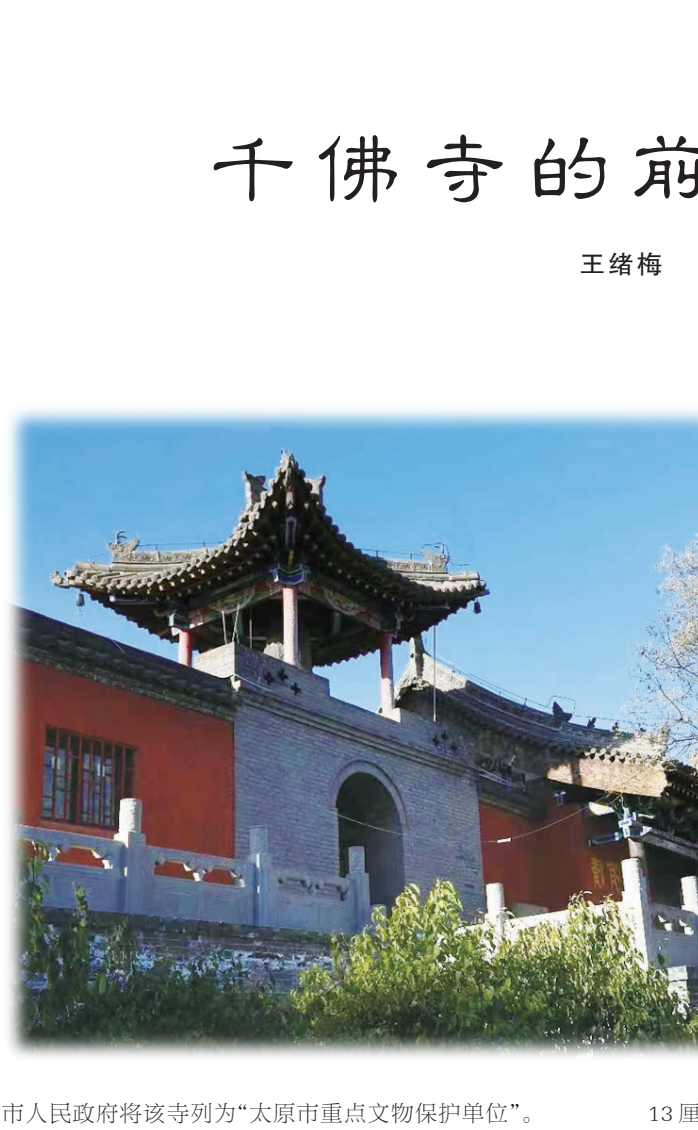
彭庆东

认干亲是昔日老太原乡村里流传已久的一种礼俗，小孩子认“干爹”“干妈”，为孩子辅以精神层面的扶助和支持，添一份养育的亲情。

没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而结成的亲戚，就称为“干亲”。北魏三大奇书之一的《洛阳伽蓝记》里有一记载，北魏时，“隐士赵逸来至京师，汝南王拜为义父”；北宋欧阳修在写《新五代史》时，还专门立了《义儿传》；明代苏州进士文林撰写的笔记《琅邪漫抄》中也写到：“赵氏干娘，高皇（明太祖朱元璋）义父之妻也。”这些历史上“认干亲”的记载，多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。与此相比，老太原人的“认干亲”多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。

在过去科学不发达、缺医少药的年代，为了给孩子免灾祛病，健康成长，人们想出了认干亲的办法。有的人家以前生子夭折，期望通过认干亲消灾免祸、保住孩子；有的人家子女不旺，认干亲以求日后人丁兴旺、家道昌盛；也有人家因母亲无法亲自养育孩子，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到奶妈家喂养，从而使孩子与奶妈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，老太原人称之为奶妈、奶爸及奶哥姐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认干亲的形式；交往过深的两家，为了更加亲密彼此之间的感情，也有愿认对方儿女做干子女的情形；有些终生无后的人家，担心自己老了无人养老送终，便渴望通过认养干子女的方式，满足老有所依的愿望。尽管认干亲的原因多样，但不失为彼时一种非血缘共同体的保育方式。

老太原的“认干亲”并非说说而已，还要选个日子举行一个像模像样的仪式，借以向街坊四邻宣示，求得乡邻们的公认，一般是在孩子满月或一岁之后。届时，



千佛寺新迁

市人民政府将该寺列为“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傅青主情系故里

郝岳才

霜。村翁身披阳光劳作，红豆杂粮米饭馨香，野鸭池塘觅食，莲藕期待收获。一个“停”字，仿佛将十月的西村定格为一幅丰收的画卷，一派田园风光，几可与陆游《游山西村》媲美。而傅山笔下的《西村夜色》，描述月光下的西村与汾河全景，不仅画中有诗，而且画中有声。傅山曾有《吃柳菇》杂记一篇，尽述西村人柳菇小吃之美，言其“风韵不可名状”：“壬午、癸未时，秋住西村，沿河柳下不时摘得，方有秋菇之美。今年秋雨绝少，重九始一场，遂能有此奇味。不惯噉此者实二十余年矣，复得食者，哪得不贪？”而在其《嘔陀南赋》《斲齏小赋》中，不仅为两种西村大麦小吃作赋，而且从药用价值进行解读，展现了西村就地取材、材尽其用的食疗文化。

《西村漫吟》传西村

《西村漫吟》十二条屏，乃傅山74岁时的书法艺术高峰之作，为后世书法家膜拜。解读诗文，多为其不同时期的诗作，有十余字有别于《霜红龛集》，当为先生晚年书写时重订的结果。傅山一生侨居他乡，足迹半天下，以《西村漫吟》为题书法诗作，其西村情结可见一斑。《西村漫吟》尽管发现较晚，但1990年即勒石于太原碑林公园，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西村，或书法艺术本身，已经成为研究傅山的重要载体。

《募缘》《题梁》志西村

傅山存世碑石文字甚多，是研究地方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献。其中，《西村三官募缘》与《关帝庙题梁》均为西村三官庙与关帝庙而作。释读傅山《关帝庙题梁》文字，可发现一段佳话。

傅山存世碑石文字甚多，是研究地方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献。其中，《西村三官募缘》与《关帝庙题梁》均为西村三官庙与关帝庙而作。释读傅山《关帝庙题梁》文字，可发现一段佳话。

老太原乡村的认干亲

彭庆东

做父母的除了要准备丰盛的酒席外，还要替自己的孩子准备一份孝敬干爹妈的礼物，礼物中最重要的是送给干爹的帽子和干妈的鞋，所谓“干爹帽子干妈鞋，脚踩两家头顶天”，此外，还要搭送些衣料、点心之类的礼品。干爹妈也要为孩子回礼衣帽、肚兜等，尤其是饭碗、筷子和长命锁，更有讲究的是碗筷要结实的银碗筷，多数是买木碗筷的，否则孩子失手摔坏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。也就是说，用干爹妈送的碗筷，等于是吃他们家的饭，依托干爹妈的福气，顺利成长，健康长寿。仪式中固然少不了磕头跪拜、敬天敬地等礼节。

礼节走动是维系干亲延续发展的路数。一般是每年的“两大节”，即春节和中秋节，干子女需看望干爹妈。春节是岁除中午，到干爹妈家“送大馍”，俗称“到干爹妈家过小年”；中秋节则是在在八月初十到十五之间的早上送月饼，讲究不能下午或晚上送。

这是老太原人认干亲后续的两大大规矩，走干亲的日子是不能随便更改的。此外，干爹妈的寿诞之日，干子女也需去看望礼敬。诚实的老太原人还认为，长大后的干子女还须照料上了年岁的干爹妈，从经济上也要给予一臂之力；而干爹妈则对干子女的盖房、婚嫁等重大事项都要过问，而且也要给予力所能及的资助与支持。可见，老太原乡村这种“合二为一”育儿方式，其实也有助于拓宽孩子的成长环境，让孩子在多一份爱的关怀下，也多一份社会责任心。

“认干亲”习俗，反映了老太原人对下一代的热切期望，体现着浓浓的乡愁和人情味。



千佛寺石雕佛像（部分）

新迁千佛寺



“治狱”一词，最早出于秦朝，庭审案件叫作治狱，讯问被告叫作讯狱。古代一般案件的审理权限都集中于地方官一身，对于官员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，这种体制下的官员，能得到“善治狱”赞誉的少之又少。在凤毛麟角般的“善治狱”人物里，有一位明代太原人周瑄。

清《太原府志》中载：“周瑄，字廷玉，阳曲人。由宣德乙卯乡举入国学。正统中，除刑部主事，善治狱。”周瑄乡试得中举人，在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职。到国子监不久，30岁时“周瑄行在吏部主事”，提拔到主管官吏的吏部，“行在”，古代是指天子所在的地方；主事，属于封建品级制度中较小的底层办事官吏，主要负责一些日常公文的处理与消息的上传下达。

没有多长时间，周瑄转为刑部主事，开始了“治狱”的职业生涯。在刑部，周瑄凭借着自己的综合素质，对于案件深入思考，条分缕析、多谋善断，获得了“善治狱”的赞誉，40岁擢至刑部员外郎。

周瑄提拔为刑部员外郎第二年，蒙古瓦剌部举兵进犯，明英宗率军亲征，周瑄毅然请纓随皇帝出征。不久，明军大败，明英宗被俘，“六师覆没”，这就是震惊明朝的“土木之变”。周瑄死里逃生后，提拔为郎中。

当时的都城北京，“土木之变”余波尚存，一些中级军官公然诬陷、纵放犯人，有恃无恐。有强盗被官府捕获，某校尉受其贿赂，胆大妄为，竟将囚盗释放，把自己的仇人冒为强盗囚禁。周瑄明察秋毫，对犯罪行为毫不留情，悉心审理，很快使案情大白，冤者得雪，擒拿为非作歹之校尉。

这年的夏天，周瑄忽然接到从外都押回的800名犯人。他担心这么多人关押在一起会引发瘟疫，于是夜以继日、加紧审理，仅用3天时间“决遣之殆尽”，全部审理完毕，周瑄的多谋善断成为刑部佳话。周瑄任刑部郎中仅一年后，经吏部尚书王直举荐，晋升为刑部右侍郎。

几年后，周瑄奉诏在顺天、河间赈灾期间，英宗复位，因为周瑄是当年随征之臣，诏他还朝，另有重任。然而，周瑄却以赈灾为首要，不听诏。英宗又亲自下诏，命令他全权处置救灾事务，提升他为刑部左侍郎。

明英宗复位后，重用锦衣卫，“数兴大狱”。面对权倾一时的锦衣卫，周瑄在镇抚司诸断案者之间“委曲开谕，多所教正”，一些狱案移交刑部后都得到了公正的处理。《明史·卷四十五》载：“官刑部久，属吏不敢欺。意主宽恕，不为深文。”周瑄在刑部任职久矣，下属官员都不敢欺瞒他。

周瑄在刑部任职近25年后擢升为右都御史，为都察院最高职位，职责专属纠察、弹劾百官，辨明冤案，提督各道，为天子耳目。周瑄“督理南京粮储”，在任上铁面无私，迅速查办贪官污吏，“捕惩作奸者数辈，宿弊为清”，多年的不正之风被一扫而空。

周瑄后升任南京刑部尚书，依然不改作风，“令诸司事不须勘者，毋出五日，狱无滞囚”，命令各部门，凡是不需要调查的案情，不出五日必须处理完毕，因此监狱中没有滞留的囚犯。为防止夏天狱中瘟疫传染，周瑄将轻罪囚犯释放，对他们说：“召汝则至。”召回囚犯时，“无失期者”。周瑄的这个决定，体现其人格魅力、治狱经验，以及任职期间的道德威望。

明大学士薛瑄《从政录》有言，“治狱有四要：公慈明刚。公则不偏，慈则不刻，明则能照，刚则能断。”综观周瑄一生，严格遵守四要，才有了“善治狱”的能力和名声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

周瑄公慈明刚善治狱

孙琨

周瑄公慈明刚善治狱